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1.0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的嬗变与审思

陈红¹,米丽艳^{1,2}

(1.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中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摘要]道德榜样叙事作为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持续展开并不断进阶。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发生了整体性嬗变,表现为:主体从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本体从单层面转向多层面与耦合化;媒介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和全媒体;环境从现实性转向“虚”“实”交融;思维从单向式“灌输”转向沉浸式引导。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应把握好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努力做到政治为魂、受众为本、内容为王、协同为要,不断增强道德榜样叙事的生命力、关怀力和感召力,促进道德榜样叙事行稳致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满足新时代人民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期待。

[关键词]新中国;道德榜样叙事;社会主流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1)02-0141-07

道德榜样叙事是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通常做法与有效手段,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总体历史进程中。马克思指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247}道德榜样叙事,就是叙事者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媒介、技术与场域来讲述道德榜样故事,在与受众平等地交互、交流和对话中,呈现、阐释并弘扬社会主流价值和道德观念,促进受众个体道德的自我表达与建构,达成受众对“善”的追求和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认同,从而实现社会道德个体化和个体道德社会化的统一。回顾并勾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的嬗变图景,深化对道德榜样叙事需要把握的四对辩证关系的认知,对科学预见道德榜样叙事未来走势,提升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质量与水平,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的嬗变图景

“人是叙事性的动物”^[2],道德榜样叙事始终与个体、社会、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历史环境、时代主题、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道德榜样叙事各构成要素及叙事思维在不同时间节点分别发生了嬗变,且呈现出清晰的图景。

[收稿日期]2020-05-2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时代的政治美学意蕴研究”(18YJCZH236)、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链式教学方法研究”(Hnjg2019ZD-7)。

[作者简介]陈红(1971-),女,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米丽艳(1979-),女,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一)主体嬗变: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

“主体、主体性不是先验和预成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整合提升的。”^[329]道德榜样叙事主体嬗变,关键影响因素有两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领域内对“主体”认知的哲学思维转换,即由原来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进行“主体—客体”两极划分转变为“主体性”“主体间性”认知,道德榜样叙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也随之完成“主体”认知变更,“叙事者”和“受述者”被视为共时性“异质主体”,叙事者是主导性主体,受述者是主动性主体,加之叙事者本人一定是面向受众的,因而交往、对话与角色交融成为道德榜样叙事的题中之义。其次,是技术领域内互联网发展引起的技术赋能,尤其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勃兴与普及,不仅打破了道德榜样叙事以往单一行政“官”主体的绝对支配地位,受众能够以“民”主体身份主动参与到叙事中来,致使“官”“民”叙事主体共进,甚至随着算法技术的应用及媒介技术的迅速更迭,互联网的社交本质致使受众的注意力变成稀缺资源,不能吸引受众注意力、无法与受众进行良性对话和即时交互的道德榜样叙事即为“无力”甚至“无效”的叙事,受众的“中心”地位凸显,沉浸、交互与对话成为叙事的关键与根本。

(二)本体嬗变:单层面转向多层面与耦合化

道德榜样作为时代精神与力量的展现,其形象及所蕴含的品格与美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有所差别及侧重。道德榜样叙事的“筑基期”(1949—1978年),叙事本体以传统道德榜样——英雄军人和劳动模范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代表人物有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吴运铎等,“红”为这个时期英雄人物最主要的特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张秉贵、时传祥等,技术型模范大量增加,“红”高于“专”;“文革”和拨乱反正时期,除“文革”中受到推崇的“另类英模”外,代表人物有孙玉国、洛桑丹增、郭风莲以及知青系列模范群体的代表人物邢燕子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色彩浓烈,强调身份上的政治性,榜样形象绝对化。这一时期道德榜样所蕴含的品格和美德表现为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以及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道德榜样叙事的“拓展期”(1978—2012年),叙事本体以精英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榜样为主,新兴行业的道德榜样涌入了人们的视野,“道德”取代“革命”成为榜样的新统摄概念,追求个人经济价值实现与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的统一,主要代表人物有周尧和、蒋筑英、步鑫生、年广久等,以及陈天桥、丁磊、张朝阳、陈欧等网络创富传奇人物,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又红又专”和创新精神,依然以“政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4326]、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评判“德”的首要尺度,但是“德”的政治色彩淡化并向多面性的道德素质转变,即在坚持主导价值观念下回归规范性与精神向往的本质。道德榜样叙事的“铸魂期”(2012年至今),道德榜样所体现的“德”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大德、公德和私德。道德榜样形象追求实现个人与社会同向飞跃发展,人民参与到道德榜样评选中来,民意自发推选和官方自觉吸纳有机融合,平凡的“美”成为评判道德标准之一,主要代表人物为钟南山、袁隆平、申纪兰以及最美教师张丽莉等,道德榜样形象呈现出多层面,具有高度道德自主性、广泛社会认同性和强烈现实针对性,尤其是在学校道德榜样叙事中,为了能够契合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和心理预期,道德榜样形象更倾向于实现传统道德榜样与偶像的耦合,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善、美”。

(三)媒介嬗变:传统媒介转向新媒体与融媒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道德榜样叙事媒介是静态媒介,即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最基本的媒介表现形式,同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由党“集中管控”的“官媒”是叙事的主要媒体,“我们党领导着全国庞大的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的工具”^[5123],全部媒介的绝对无缝隙覆盖是道德榜样叙事实效性获取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曾指出,“技术的发展将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6342]。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之后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成为道德榜样叙

事新的增长点,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新媒体出现并日益发展,经由精英媒体向大众媒体、个人媒体次序递进,QQ、微博和微信等以个体价值自我实现为特征的社交媒介以及短视频、动画等动态媒介迎合了受众的需求,“人”成为媒介的中心,助推了道德榜样叙事媒介向动态媒介与媒体融合发展。历史虚无主义叙事凭借新媒体兴风作浪,与道德榜样叙事针锋相对、同台博弈,同时,自媒体时代的权力下移和权力分散,致使道德榜样叙事的实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效融合程度,融媒体和全媒体成了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

(四)环境嬗变:现实性转向“虚”“实”交融

在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以前,道德榜样叙事环境只存在于现实中,包括物态环境和教学环境,其中物态环境资源丰富,国家建设力度大,教学环境简陋,并无技术支持、环境创设或个性化体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打破空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并实现网络的迅速普及,尤其是个人门户网站的推广,道德榜样叙事的网络虚拟环境随之产生,日益发展为道德榜样叙事和历史虚无主义“道德榜样”叙事交锋的主阵地。2013年中国移动开始大规模部署4G网络,移动客户端的便捷以及广泛应用因其零距离、慧分享、便操作等优势重塑了人们的思维,更加助推了传统实体场域与网络虚拟场域的融合,尤其是学校作为道德榜样叙事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进行道德榜样叙事时不再只局限于某个“实”或“虚”的场域,而是转向技术辅助下的“虚”“实”良性交融,以促使学生获得更深层次的个性化体验,增强学生的叙事主体地位和人际交往自信。

(五)思维嬗变:单向式“灌输”转向沉浸式引导

上述道德榜样叙事各构成要素的嬗变,导致“受众”不仅是叙事主体,而且跃升为叙事的中心。自此,单向式“灌输”和“垂直注入”不再是道德榜样叙事的“全部”与“重点”,如何将道德榜样叙事与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深度融合,成为道德榜样叙事新的关注点。通过利用网络微时代的“脱域性”与“互联网+”时代的跨界性,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与受众平等对话与即时交互,尊重和满足受众道德自我的倾诉和表达,使受众沉浸于“故事”引起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位的立体感知和享受中;另一方面受众在与叙事者或者其他受众的交互中“吸取适合他自己的一切,展现他原有的观念和情感”^{[7]2},控制和自觉地驾驭自身的感性与理性,自我辨别与选择价值认同与价值信仰,实现精神的愉悦交流与生命意义的真诚分享,从而得到真正的启蒙,获得真实感、体验感、获得感与自我效能感,成为道德榜样叙事的重中之重。因此,传统单向式“灌输”转向沉浸式引导,是道德榜样叙事思维发展的必然与遵循。

二、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应把握的四对辩证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嬗变图景显示,嬗变是在各种辩证关系的妥善处理中得以实现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事关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完善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有四对,即政治性与人民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批判性与建设性、主导性与主体性。

(一)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政治性是道德榜样叙事的首要属性和鲜明特性。所谓政治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一致,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一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遵循和价值引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时、效、度”,在思想根源上正本固元,于不断解决现实道德生活的问题中开创新局面。所谓人民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理念,依靠人民、融入人民、服务人民。具体而言,要尊重人民在叙事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人民成为叙事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与人民平等对话,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道德困惑和思想难题;为人民提供积极、健康和充满智慧的精神食粮,提升人们的道德审美能力和审美境界,用高质量叙事成果“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时代”^{[8]44}。进而言之,将人民接不接受、参不

参与、认不认可作为道德榜样叙事优劣评判的唯一标准,于普通民众具体可感的日常道德生活实践中探求道德榜样叙事发展的空间和新的生长点。唯有做到政治性和人民性相统一,道德榜样叙事才能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又充分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二)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所谓历史性,即道德榜样叙事有其本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榜样叙事是一个整体系统,历史道德榜样叙事作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到整体规划与进程中来,客观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道德榜样叙事的成就与局限,坚持整体运营、传承发展。同时,提升历史道德榜样叙事解读的客观性,增强历史道德榜样再叙事的现代性,使历史道德榜样再叙事契合新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以能够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9]所谓时代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立足现实吸收外来,植根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回应时代问题与现实关切,“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10]。道德榜样叙事要致力于将一切彰显时代特质的叙事主体、本体、媒介和环境等“活性”要素恰切地融入叙事中来,于时代嬗递中开放、拓展受众的叙事视野,达成叙事者及受众的视野交融与认知融合,增强道德榜样叙事的时代魅力。唯有做到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道德榜样叙事才能既体现历史传承性,又回应时代问题、增强时代魅力。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

所谓建设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以立为本、善于“掌舵”,充分利用叙事主体、本体、媒介、环境等叙事各构成要素,通过打好“组合拳”去识别个性需求、优化媒介交互及澄明叙事空间,实现道德榜样叙事的整体优化、内部活化和多维细化,在思想根源上正本固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达到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和提升受众个体道德品质双重目的的统一。所谓批判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以破为重、善于“亮剑”,敢于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特别是对历史虚无主义“道德榜样”叙事能够科学辨识并且保持战略清醒与定力,“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1],同时,多领域、多部门齐抓共管、防微杜渐,做到德、法相融合,不断化解历史虚无主义“道德榜样”叙事的渗透力、攻击力和拆解力。唯有做到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道德榜样叙事才能既善于“掌舵”、弘扬主旋律,又勇于“亮剑”、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

(四)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所谓主导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牢牢占有叙事的主导权,坚守叙事者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确保叙事处于可控、可预测之中,不迷路、不偏航。同时,发挥叙事者的指导、关心和协作作用,引导受众成为叙事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告诉受众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什么价值倾向是可以接受和期待的,使受众在叙事互动和经验处理中受到思想启迪、信仰启蒙、价值启发和精神启示。所谓主体性,即道德榜样叙事要看到受众、走进受众、了解受众、发展受众,承认、尊重并充分发挥受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受众参与叙事的热情和志趣,使受众作为“完整的人”而不是“弱势卑微的个体”平等地参与到叙事中来。在道德榜样叙事中,受众认识自我主体性的角色,真诚地袒露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表达真实的自我,在与叙事者的对话互动中完成道德自我的建构与道德生活方向的探寻,实现道德判断力、道德选择力以及道德审美批判思维的提升。唯有做到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道德榜样叙事才能既占有叙事的主导权,又发挥受众的主体作用。

三、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的路径审思

由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榜样叙事嬗变图景可知,始终与时代同向、与人民同在、与社会同行是道德榜样叙事的鲜明品格和巨大优势。新时代背景下,道德榜样叙事要处理好上述四对辩证关系,注重按图索骥、沿迹寻踪,紧紧围绕政治为魂、受众为本、内容为王、协同为要等四个发展指向持续深耕且善做善成。

(一)政治为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道德榜样叙事的根本旨向。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道德榜样叙事须继续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遵循和价值引领,将之与受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事关国家、民族主题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微观视角融为一体。道德榜样叙事要做到“七有”: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2]的根本目标服务,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有更高的政治站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13],讲好中国人、中国梦的故事;有开放的叙事视野,面向世界、面向现在与未来,讲好中国大国担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有鲜明的批判斗争精神,将正面典型叙事和反面典型叙事相结合,“亮剑”历史虚无主义,讲好典型道德榜样的故事;有丰厚的历史积淀,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历史意义,把握历史限度,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故事;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心灵慰藉和精神滋养,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明确的价值操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好中国价值的“建构者”。做到“七有”,道德榜样叙事就能够因其叙述的教益性、可感性和丰富性说服人、武装人、引领人,使受众在道德情感上信服、诚服、悦服,自觉将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在“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并积淀成信仰,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二)受众为本: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道德榜样叙事理念

作为道德榜样叙事的主体,受众“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14][87]},是叙事的生存土壤和根本力量,因而是叙事天然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无受众不叙事。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要坚持受众本位,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叙事理念,深化对受众认知认同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融入受众、服务受众、依靠受众,始终把受众及其需求置于首位。融入受众是指道德榜样叙事与受众相贴近,关照受众生活实践,关注受众生命特质和体验,关切受众道德思维和道德情感、关心受众利益诉求和兴趣偏好,与受众的理解力、承受力、处理力相匹配,使叙事能够切中受众需求,寻求受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与受众产生情感共情与共鸣,引导受众敞开心扉,继而对受众实际道德困惑和思想难题进行快速反应、深度分析和有效引领。服务受众是指道德榜样叙事与受众爱“分享”,站位要高,视野要开阔,格局要大,将有“活性”的现代叙事要素全部融入到叙事中来,使叙事作品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为受众提供积极、健康和充满智慧的优质叙事成果,促进受众道德判断力、道德选择力和道德审美力提升,能够澄清困惑、明辨是非,最终形成道德智慧。依靠受众意味着道德榜样叙事与受众相互“激荡”,将叙事的关键环节从榜样故事单向“输出”的需求侧迁移到故事述中或述后主体间的探究、对话、交流甚至论争的供给侧中来,重新定义受众在叙事中的地位,视受众为叙事过程的合作者、叙事情境的共同体验者、道德思想碰撞的对话者等可以也必须相互依存的力量,优化与受众的交往方式,增强受众的参与感、体验感、获得感与价值感,依靠与受众进行平等对话、深度互动实现彼此间道德的共生,达成道德榜样叙事灌输性和启发性的统一。

(三)内容为王:推进技术与媒介融合双轮驱动的内容建设

内容是传统媒体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实效性获取的基石。新媒体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只有继续在优质内容上深耕细作,才能持续引领和获取受众的注意力资源。道德榜样叙事坚持“内容为王”,并不否认媒介与技术对于叙事的重要意义,而是以对技术和媒介的科学运用为前置条件,契合数字时代、图像时代以及社会的媒介化特质,在技术支撑与媒介融合双轮驱动下实现的。但是,对于媒介、技术与内容之间关系要保持足够清醒,防止三者之间地位的本末倒置,牢记内容建设是道德榜样叙事的根本,媒介融合与技术驱动作为“手段”探寻并触发道德榜样叙事的活力,为优质内容输出服务,避免落入以

“手段”遮蔽“目的”的窠臼,更不能迷失于单纯迎合受众的形神离迁的泛娱乐化中。质言之,道德榜样叙事应顺应媒介发展的趋势,推动静态媒介和动态媒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相融合,根据媒介特质创新内容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推出形式多样的图解、图文、动图、音视频等跨媒介“优化组合”,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并充分占有新渠道,将上述内容与报纸、期刊、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电子屏幕等媒介深度融合,形成适应各种不同渠道传播的内容生产体系,使具有权威性及思想深度的内容在不同媒介间恰切地转换与流动,吸引受众的目光,满足受众高质量的文化需要。同时,道德榜样叙事要以技术驱动为重要突破点,时刻瞄准信息技术最新发展成果,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各种教学辅助技术的运用,改变受述者的被动接收状态,使其能够以主动操作、全体覆盖、彰显个性、深度互动的方式参与道德榜样叙事,沉浸于“如临其境”、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维感官体验逼真的叙事氛围中,进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15][40]},达到个体道德品质的提升。

(四)协同为要:建构多主体协同联动的道德榜样叙事常态长效机制

“谁来叙事”,既是责任归属问题,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关新时代道德榜样叙事发展的格局与走向。一般来讲,道德榜样叙事的主体由国家、社会和学校组成,国家整体谋划道德榜样叙事工作布局,社会有序地完成道德榜样叙事任务,学校是道德榜样叙事主渠道。因而,道德榜样叙事应该全国“下好一盘棋”,搭建国家主导下各叙事主体在“种好责任田”基础上练好“组合拳”、实现“跨界”整合的多主体协同叙事格局,从“各自为营”向“协同联动”转变。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广覆盖要与注重主渠道并重,充分发挥学校这一主渠道作用,促进学校道德榜样叙事主体充盈与延展,以“新的力量”激发道德榜样叙事新的增长点。换言之,要在学校发起道德榜样叙事的“课程革命”,改变只有“思政课程”和思政教师才需要进行道德榜样叙事的传统观念,深入挖掘其他叙事元素和资源,构建以课程为“切入点”、以教师为“突破点”的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协同联动的大中小学一体化的道德榜样叙事常态长效机制,这就意味着道德榜样叙事体系需要完成三个联合和两个保障: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联合,需要国家统筹、各省市学校党委具体设计;各门思政课程内部协调与协作,需要思政课教师对自身及其教授的课程有正确认识,思政课是道德榜样叙事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是道德榜样叙事的支撑主体;专业课教师通过挖掘课程中蕴含的道德榜样叙事元素,进行不同内容和程度的道德榜样叙事;从实施路径来加以保障,要求道德榜样叙事贯穿“全过程”,实现自始至终;从运行方式上加以保障,要求道德榜样叙事实现“常态化”。

道德榜样叙事是一个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作为多要素和多矛盾关系的统一体,道德榜样叙事要牢记初心与使命,坚持政治为魂、受众为本、内容为王、协同为要,不断增强道德榜样叙事的生命力、关怀力和感召力,促进道德榜样叙事行稳致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满足新时代人民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期待。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7]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

2018-01-06(1).

- [10]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5).
-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习近平.在2019年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9-03-18(2).
- [13]习近平.致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8-06-15(1).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The Evolution and Reflection of Moral Example Narr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en Hong¹, Mi Liyan^{1,2}

(1.Marxist College,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2.Marxist College,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Shanxi, 030051)

Abstract: Moral example narration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advance in the overall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people from standing up, getting rich, and becoming stro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al example narration has achieved an overall evolution. The subject from subject and object dichotomy to intersubjectivity; ontology shifted from single level to multilevel and coupling; media from traditional media to new and all-media, the environment from reality to "virtual" and "real" blend; thinking from one-way "indoctrination" to immersive guidance. Moral example narr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times, the unity of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veness, the unity of dominance and subjectivity.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the "four actions", namely: politics as the soul; audience-oriented; content is crucial; syner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We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solicitude and appeal of moral model narration, promote its stead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better provide people with spiritual guidance, and meet people's needs and expectations for high-quality spiritual lif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al Example Narration;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责任编辑:钟淑洁